

黎澍十年祭

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黎澍十年祭

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黎澍十年祭/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1

ISBN 7-5004-2406-X

I. 黎… II. 黎… III. 黎澍-纪念文集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373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6

字数: 275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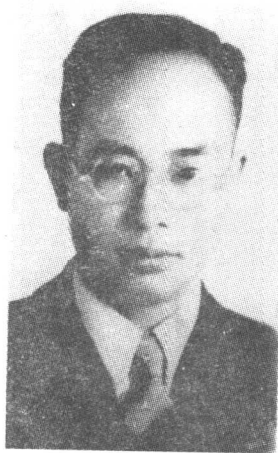


图1 1941年,黎澍先生在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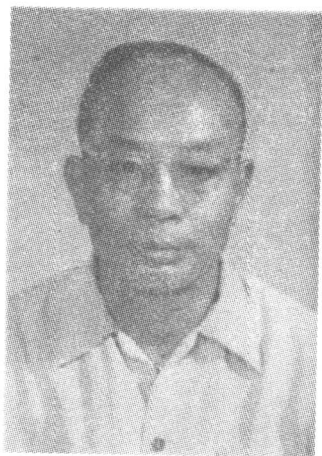


图2 1966年7月6日,黎澍先生摄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次被批斗大会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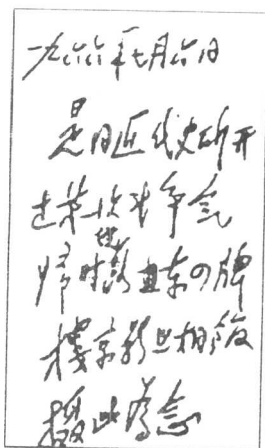


图3 黎澍先生在木樨地寓所书房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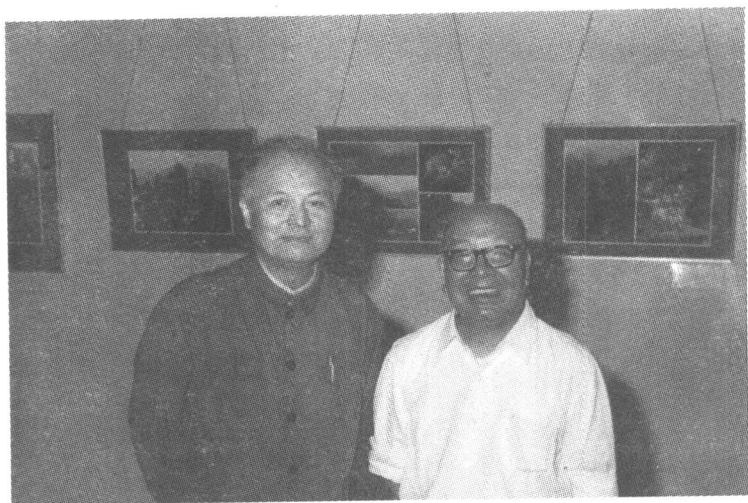


图4 80年代初,黎澍先生与李锐先生在一起



图5 1981年10月,黎澍先生与严济慈、关山复先生在一起



图6 1983年9月27日,黎澍先生参观康有为故居



图7 1982年5月,黎澍先生与周扬先生出席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举办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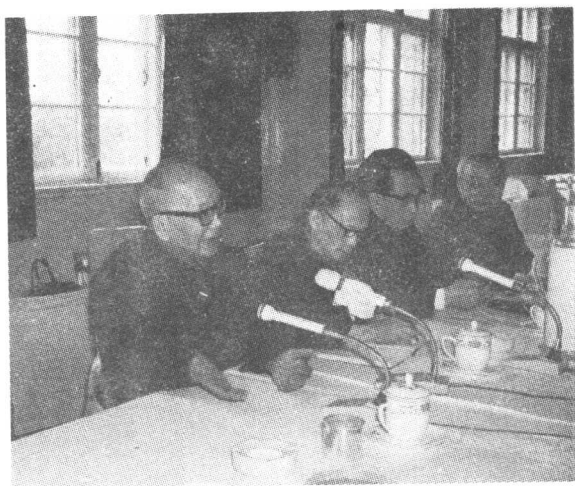


图8 黎澍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组织的学术会议上讲话



图9 黎澍先生会见来访的外国学者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黎澍	于光远 (1)
我和黎澍几个时期的交往	于光远 (15)
黎澍十年祭	李 锐 (26)
黎澍老夫子	李 普 (45)
知己的怀念	李 新 (58)
最好的纪念	谌 震 (64)
黎澍学述	唐振常 (68)
反思中的探索	
——评《再思集》关于发展中国历史学的 见解	傅白芦 (74)
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	
——忆黎澍同志	戴 逸 (90)
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	
——忆黎澍的学术生涯	丁守和 (99)
黎澍学术思想述略	丁守和等 (157)

唯物史观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	王若水 (192)
肃清封建影响何时排上日程	
——忆黎澍对旧戏的思考	李洪林 (206)
黎澍论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封建残余问题	李学昆 (212)
黎澍论学	丁伟志 (225)
片断的回忆	朱 正 (240)
黎门师从记	喻松青 (246)
黎澍的“考求历史真实”及其他	徐宗勉 (258)
黎澍先生十年祭	陈铁健 (271)
再忆黎澍	谢本书 (277)
回忆黎澍同志	耿云志 (290)
历史创造者问题拨乱反正的理论意义与实践	
意义	姜义华 (296)
闪光的思想 无尽的怀念	
——回忆黎澍先生	蒋大椿 (308)
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悼黎澍	孟宪范 (337)
黎澍先生著述要目	黄春生 (341)
后 记	(347)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黎澍

于光远

从1938年起到他1988年去世，黎澍和我是有五十年交往的老朋友。1938年我们相识在长沙，但只有一面之缘。十三四年后，1951年我们在中南海重逢。在那幽静的御花园中，我们隔若干天就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闲聊。如此有四五年，彼此成为知己。1955年他调到位于西郊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五年左右我们又无往来。1960年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并迁入中宣部工字楼宿舍，我们又有五六年成为近邻。接着在那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各自成为群众专政的“牛鬼蛇神”，在自己的单位挨批挨斗，不能往来。在这期间我很挂念他，不知他安否。几年中彼此总算都熬过来了。1977年，党中央任命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原有的“中国科学院”五字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七字。我和他自然而然地又成为同事，一起工作，一直到1988年。

我和他相识五十年中，联系经常被中断，但能在一起的时间也有二三十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可以说这样一句话：他很早就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研究学问的指导思想，并在经历了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成为一个反教条主义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为我和

许多人所敬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写到“成熟”两字，我就想到在1990年党员登记时，单位要我写一个“思想总结”。在这个“思想总结”中，我写自己经历了那场“文化大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成熟”了。这个思想总结是供一个会议讨论用的，与会者中有几位同志对这个说法大不以为然，他们不理解，甚至表示怀疑。事实上，我在“文革”前虽然早已摒弃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有不少，还不能对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前途有的确是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在“文化大革命”后做到了这一点。我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例如我们总不能说毛泽东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吧，可是他犯过的错误就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与否的标准，是系统地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能够独立思考，对自己有过观察研究，对实践经验范围内的问题能够作出比较正确判断的人。那一次我是就自己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标准的问题发表意见，着重点不是说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如何，更不是说自己对世上各种事物、各种问题能否作出正确判断。我完全明白自己对世上的许多事情全然不知，对许多事情知之甚浅。但这并不妨碍我说自己是一个已经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文革”结束时，我已年逾花甲，而在90年代说这话时，我已经75岁了。如果不是那场“文化大革命”，自己不知还要多少年才能完全摆脱思想被束缚、总处在“老成熟不了”的状况下。

自从第一次认识黎澍开始，我就认为他比我老成，用我后来的话说比我“成熟”。他不但长我三岁半，而且参加革命也比我早得多，1925年他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土地革命，并加入了国民党；那时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虽在南京路惨案后，在一位小学老师率领下，手持小纸旗上街宣传过抵制英货、日货，但这

只是一个普通小学生的行为。黎澍在加入国民党、参加革命之后，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他因参加土地革命及农民协会驱逐湖南军阀许克祥的活动遭到醴陵反动派的通缉。而那时我的觉悟程度并没有比1925年有任何提高。1935年，我们在北平都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自己认为这次运动对他觉悟的提高有重大意义，他在一二九运动时的思想基础、革命根底比我要深厚很多。“文革”前，他的文章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但是我想，恐怕他同我一样，也是经历了“文革”之后才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纪念黎澍时，我想用现在这个题目着重去写他，记述“文革”后我和他在社会科学院时期的合作和共同奋斗。关于我在长沙《观察日报》社同他的第一次见面、建国后我们在中南海重逢、后来他搬到中宣部工字楼宿舍等几个时期交往的回忆，我单独写成短文，附在这篇文章的后面。

一、黎澍与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

事情还要从“四人帮”被粉碎说起。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政治，我与黎澍的看法不谋而合。黎称之为“封建专制主义”、“封建法西斯主义”，我则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两个人的说法意思是差不多的。我们认为从十年中必须吸取的教训是不能不要民主，反而应该充分发扬民主。民主和自由素来是分不开的。发扬民主也就是要提倡自由。既然“四人帮”等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在他们被粉碎前，谁发表这样的议论，是一定要被视作“恶毒攻击”，并处以重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说这样话的人就多了，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但怕听而且反对。在1979年举行的理论务虚会期间，在应不应该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上就有过一场

争论。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的第一次发言中（这次发言是以王惠德、我、杨西光三个人的名义，由我主讲的），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那时我对当时党的文献上常用的一句话“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很反感，认为这一句话是很错误的。我不反对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在某个特定的事情上，用强化国家机器的办法来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但是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就是国家消亡的开始。而社会主义事业要依靠民主，而不能依靠不断强化的国家机器。我的这些思想常和黎澍一起讨论，彼此的观点一致，谈得非常投机。黎澍和我抓问题的重点有所不同。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更着重揭示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依然存在封建势力的残余。他认为，封建思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在社会生活——尤其在政治生活中还严重存在。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大暴露，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也不容轻视。从黎澍1977年后写的文章题目，如《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等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脉络。

197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工作是由我主管的。纪念“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五四运动的整生日应该让德赛两先生走到中国社会舞台的前面来。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前一年，我就同黎澍说起这个问题。他在1978年5月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与科学——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的文章，反映了我和他的共同观点。在1979年初我就提议成立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筹备组，由周扬、黎澍、温济泽和我四个人负责，组织纪念会上的文章，筹备召开大会。在筹备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决定请周扬作会议的主题报告，同时也请黎澍等几位同志在会议中作长篇发言。那时我和黎澍已经看出有一种贬

低民主的思想已经在实践中显露出来。胡乔木就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能让这种思想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中更广泛地传播。黎澍在会上作了《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讲话。黎澍的这个讲话经过整理，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近代史研究》第1期上，后来收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黎澍自己选编的《再思集》中。周扬那篇《三次思想解放》的写成，黎澍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开好这个会是我在三中全会后和他的第一次合作。

我想在这里对黎澍这篇文章简单地作一点介绍，因为这篇文章中的不少话直到今天都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讲得很透彻。

这篇文章讲了四个问题：“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问题”；“中西文化问题”；“知识分子的道路”。每个部分都有独到的见解。

在讲第一个问题时，他根据史实指出，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游行示威完全是自发的，规模不大，参加的群众约三千人，缺乏严格的组织领导。以我们现在的目光看，说是“少数人”“闹事”并不为过。但五四运动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猛烈攻击，在一代青年中打垮了这个最顽固的堡垒。这个顽固堡垒的倒塌，使封建社会的所有不可侵犯的神圣全部失灵，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是独立的人，有做人的权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人们能够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国际革命思潮，争取新的革命行动，举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黎澍在进行了这种分析之后作出一个概括：“五四运动尽管完全是自发的反抗运动，但是同时它又是中国人民进行自觉反抗的开始。”

黎澍在讲这个问题时，接着又讲了在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彻底平反的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写道：“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它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称之为

‘四五运动’。这不仅因为两次运动发生在同一地点，而且因为两次运动都带来思想大解放。同五四运动比起来，四五运动是有高度自觉性的群众运动，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群众行列的有大量共产党员，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们，这次斗争规模大、影响广，都远远超过了五四运动。尽管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但是许多机关、学校和工厂的党委支持群众的斗争，广大群众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完全是自觉的。”

在讲第二个问题时，黎澍指出，五四运动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异常坚决、异常猛烈的攻击，确实表现了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但是“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广度、深度上都是很不够彻底的。在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驱除了一百多年盘踞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消灭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之后，我们每个人都继续感受到封建传统依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历史，它有如阴影紧跟在我们背后，处处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阻碍和破坏。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封建传统的清除从来就是不彻底的。黎澍引证马克思的话，“除了现代的灾难以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它们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接着黎澍讲道：“我们要使活人过得好，必须在思想上摆脱死人的纠缠。”这就是说，“必须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方式，彻底地清除一切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

在讲第三个问题时，黎澍介绍了张之洞的《劝学篇》，这是本反对变法维新的政论集。张之洞写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特别指明自己痛恨“民权”“自由”之说，写道：“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

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黎澍在讨论中西文化问题时指出“对西方文化的恐惧不仅存在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于革命党内部。”当时革命党内有个国粹派，他们心中对欧化怀抱无穷的忧虑，说“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他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他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黎澍指出：“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接触到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除了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兴起这样一个笼统的观念之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根据确凿的史实，他进一步指出：“只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思潮洗礼的人们，才有可能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实质，并给以批判，而且首先要与传统的封建思想彻底决裂，否则他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想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黎澍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他主张对待一切文化遗产包括西方文化或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原则是“要有选择，还要经过消化，区别精华和糟粕”，主张要先去读古今中外书籍，像对待食物一样，先把它吃下去，然后加以消化和吸收。

黎澍讲的最后一个问题的中心思想是，认为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选择道路的问题。除了极少数人坚决和反革命站在一起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道路：或者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或者是在反动政权下做些他们自称是‘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一类的工作”。他认为，“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就这一点说，他们并不适合反动政权的需要，因为不论是北洋政

府还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都把恢复和发扬中国封建文化当作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根本，而对科学和民主采取排斥和敌视的态度”。黎澍说，不能因为这些人当时对革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暂时和革命缺少直接的联系而鄙弃他们。黎澍的这番议论同当时流行的观点大相径庭，是针对批判白专道路等有感而发的。

黎澍那年讲这四个问题时，所作的这些论述，即便在今天也很能启迪人们的思考。

二、黎澍与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工学术研究工作，同时兼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研究会的理事长^①，因此早在1981年我就提出筹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活动问题，开过几次筹备这一活动的会议，布置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撰写纪念文章。我认为这次纪念活动十分重要，因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历史进步对它提出的要求，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误会，又极大地妨碍我们的事业，同时社会上也已显示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漠，需要借此纪念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一次有力的推动。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各有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了这个纪念，我想写一篇题为《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我的基本思想是，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外，以前结合世界和中国实际着重研究和发展起来的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今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要根据新的历史进展作新的研究并予以发展。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的、过去未曾研究过、也无法研究的新问题，而且已经积累了大量事实和思想资料，因此需要